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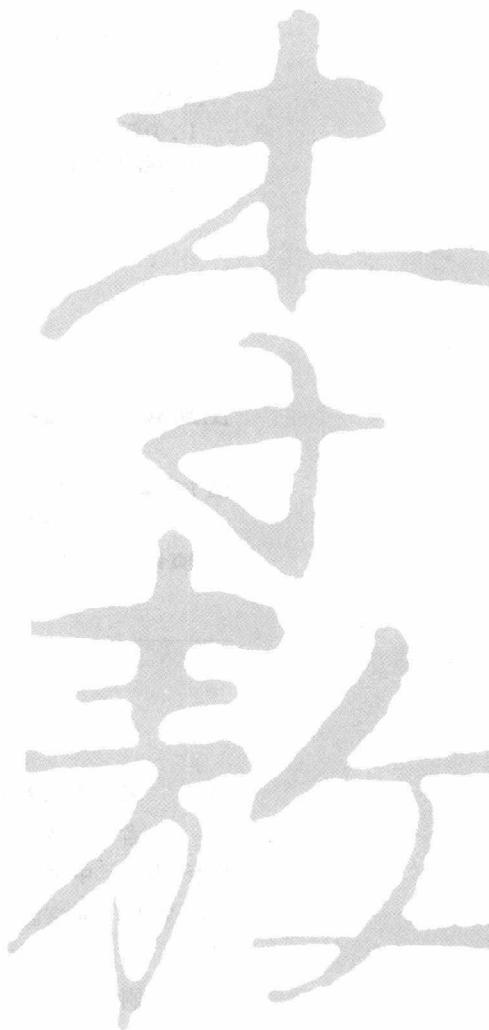
李敖 大全集

1 北京法源寺

李敖
大金集

1

北京法源寺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版李敖大全集 / 李敖著. --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10.7

ISBN 978-7-5057-2752-6

I . ①新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李敖 - 全集 IV . ①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9401号

出版编辑委员会 王东升 孙以年

史宝明 张 纯

责任编辑 杨学梅 马 瑞

周亚灵 邵嘉瑜

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

书 名 李敖大全集

作 者 李敖

出版/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营销/推广 北京创美时代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710 × 1000 毫米 16 开 930.75 印张 14644 千字

版次/印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57-2752-6

定 价 2000.00 元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
邮编/电话 100028 (010)64668676

李敖六十不封笔
甲子之年定全集

《李敖大全集》自颂辞

英国文豪萧伯纳说每当别人捧他他就扭捏不安——因为别人捧得不够，李敖也是如此。在《李敖大全集》问世之日，他只好自为颂辞。

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一百五十年间的两大问题是如何避免挨打、如何避免挨饿。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如今已经不再挨打，但经济力量的落后仍然有人挨饿。我们打得过帝国主义的子弹，但抵不住帝国主义的面包……（编者略）

鸦片战争带给我们的困境，不止军事的和经济的，更根本的，乃是思想的。——我们的传统思想已不能使我们脱困，而生吞活剥来的华洋杂处思想与主义又增加了我们新的困难，要想重建我们的信心、矫正我们的方向，我们必须重新输入真知识。——“知识是力量”，培根说错了，知识不是力量，真知识才是力量。

在知识爆炸的时代里、在密密麻麻的书架上，如何能从李敖写的书里输入真知识，你才是会读书会选书的聪明人。别以为你看了不少书，没看过李敖的书，就证明你头脑有问题——因为你没被全面的智慧启发过。李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全面性智慧的人，中国人中虽然不乏有智慧的，但多是局部的、片段的、顾此失彼的，要论全面性智慧，古今一人而已。舍李敖外，第二人休想。

具有全面性智慧，是李敖的书的最大特色，认为李敖文章第一流的人，其实不足以尽李敖，虽然第一流的文章足以使他千古不朽，但全面性的智慧才使他万古常新。

2 | 李敖大全集(卷1)

《李敖大全集》是李敖的书在他六十之年的一次总结集。他用这些真知识,展示了他的力量;你可用这些真知识,给你因“充电”而有力量。——李敖说他博学多闻,他自己无需“充电”,他根本是发电机,他一身是电。

1995年9月10日在中国台湾

大陆新版序

李敖

1986年，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。那次采访，有很坦白的对话，中间涉及了海峡两岸的优劣比较。邓小平说：

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，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。差距是暂时的。拿大陆来说，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，有些失误，耽误了，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，发展速度不会慢，距离正在缩小。……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，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。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，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。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，是不全面的。

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，邓小平的预言，早已成真，他口中的“整体力量”的国力，已化为“综合国力”驰骋世界。而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伪政权足以夸口的诸多单项“发展程度”，相形之下，也就“缩小”了、乃至瞠乎其后了。

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单项发展，值得特别讨论。

远在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起，这个伪政权，就大力打压言论自由——伪宪法中白纸黑字保障的言论自由。在漫漫长夜中，先后有两道星火，更是伪政权大力扑灭的对象：一个是胡适发端的《自由中国》杂志，一个是李敖殿后的《文星》杂志。

四十五年前，在国民党大力扑灭《文星》杂志的时候，我曾说：“文星是一

道主流，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，但反对之道，还有规格可寻、还可聚合各路细流，成为高明的导向；文星一旦没了，主流就会变成乱流，国民党早晚会更惨，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。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：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，他们将欲求有《文星》而不可得！甚至欲求有《自由中国》而不可得！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——迟来的发现——《文星》《自由中国》式的反对他们，是太客气了的！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，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。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，他的看法，真是一针见血了！”

如今，四十五年过去了、五十五年过去了、六十年也过去了，国民党伪政权尸居余气，早已无力打压“主流”言论了。但是，如我早就预言了的，四面八方的“乱流”淹没了它，也淹没了中国的台湾岛。这个岛，已经坐失了“高明的导向”，一切都太迟了。

一个插曲不可不提。当年国民党伪政权大力扑灭言论自由，并不止于查禁杂志，杂志是一时的，半个月一个月就完成了“阶段性使命”，真正源远流长的，不是杂志而是丛书，这也是《文星》杂志远胜于《自由中国》杂志的地方。《文星》有书店跟着，《文星》封门了、李敖下狱了，李敖的地下丛书还在流窜。更精彩的是，李敖出狱后又重操旧业、又增加了几十倍的反动书刊，光是李敖写的、被查禁有案的，就高达九十六本，造成了古今中外写禁书最多的世界纪录。最耐人寻味的，是大力扑灭几十年后，主持查禁的国民党许历农上将，公开向我口头道歉，并写信向我表示，他垂老寻思：当年若从宽处理查禁事件，对促进自由民主，或有正面作用。我拿到他的信，不无戏谑性的到处张扬说：“看吧，不查禁李敖的书，原来也不会亡党亡国呢！”

虽然一切都太迟了，但我仍然佩服这位白发苍苍的将军，他老骥伏枥，充满了服善之勇！

李敖这句“不查禁李敖的书，原来也不会亡党亡国呢！”名言，其实是一句双面论。对当年的国民党而言，这是一种轻怨薄怒；但对今后的共产党而言，却是一种醍醐灌顶。对李敖的言论自由开放又再开放，不代表示弱，而代表有自信、代表我们共产党有自信受得了你。“让他们骂，骂得无理，我们反驳，骂得有理，我们接受”，这不正是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《论十大关系》中的话吗？多么有自信心啊！

在中国台湾、在海峡这边，经过几十年的殊死战，我的丛书已经完全不加查禁了。但是，我并不乐见这一单项发展只在中国台湾、只在海峡这边。“综合国力”涵盖的单项很多，邓小平说：“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，是不全面的。”这话说得有道理。除了“国民平均收入”以外，有些单项，大可不必落后的，也不必甘落人后啊。单项不止于“国民平均收入”啊。

陈云林第一次来台湾，刘长乐安排我和这位祖国大员有一次秘密见面。在夜幕低垂之时、在圆山饭店密室，我带了我的新作《虚拟的十七岁》送给他，并向他“抗议”，为了这本书不能在祖国出版。陈云林笑着收下了我的赠书和“抗议”，对我神秘一笑，我也神秘一笑。我想起邓小平的话：“差距是暂时的。”“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，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”。

2010年到了，我收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佳音，要出版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了。这一新版，“在1999年版的基础上恢复增加篇目近百篇，文字一百四十余万字，几近台湾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全貌。”几近台湾版的全貌，说明了邓小平“距离正在缩小”的前景，并非虚言，“大陆的潜力”正在发挥了。问题是我现在行年七十六岁，我计划八十岁时，再加出一倍台湾版的《李敖大全集》，就是由目前的四十册变成八十册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为“综合国力”，更百尺竿头。到时候，出版社恐怕更得新版又新版、更得赶了。不过，也不必忧虑。第一、我未必活得到八十岁，未满八十身先死，自不发生出书问题。第二、到时候全世界已不出纸本书了，都网络电子起来了，没人给我出纸本书了，也不发生出书问题了。

2015年4月25日，我八十冥寿，身为促狭之鬼，也许我会向前来对我遗像致意的祖国大员开玩笑：“云林老弟啊，共产党的运气真好！共产党的运气可真好！”

2010年3月8日，在中国台湾

大陆版引言

王得后

《李敖大全集》横渡海峡，先于本人来归大陆，在这云水阻隔几近半个世纪，必将统一而尚未统一的时期，对于两岸思想、文化、心灵的交流，无疑有着特殊的意味。深情的哲人早有感慨：“自然，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，相关心。然而最平正的道路，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，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。”何况海峡两岸是固有的血脉，同根同源的文化，本应有更多的作者、编者、读者来走沟通的道路的。

李敖，一个个性卓异的知识分子，一个大有学问的作家，用他狂放恣肆，百无禁忌，言必有据的文字，震动台湾，名噪一时。

这是一定的，在像台湾那样一个禁锢得像罐头的专制制度中，知识分子要喊出独异的心声，必然遭到执政者的打击。1971年，国民党挟恨陷害，将李敖逮捕下狱，以“叛乱罪”的恶法判刑十年。待到蒋介石“总统”死亡，才获得减刑出狱。李敖用生命赢得了搅醒社会的功效。代价是追不回来的青春，自然无比巨大。

这也是一定的，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”“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”。专制、酷刑从来没有阻挡志士仁人和求生存的群众前仆后继。非人间能忍受的苦楚，锻炼着坚贞者的情操。李敖出狱后，更坚定更飞快地走自己的路：他认为“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”的路，用“是非挂帅”的原则，“历史是不讲感情的，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”的理性，“一切就是要

公开”的态度,研究和批判国民党、“党外”、民进党,为台湾的现代化,为中国的统一,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而继续创作。

1995年,台湾荣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《李敖大全集》,计二十册,这是他前半生苦斗的记录,可是李敖已然感叹:“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”。他认为“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。在许多方面,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,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浑蛋,品味能力也已大坏。”他认为“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,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专家的部分,也许有相当成就,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,这是很可怕的。”其实,作为文章,比起“配读”与否来,更根本的还在于人们值不值得去读。

李敖生在大陆,根在大陆,启蒙在大陆,初中二年的时候,才随父母“应变”去到台湾;成长在台湾,成就是在台湾。姑无论李敖自信自己是“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”,“并不止台湾出了个李敖,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”;根本还在文化。台湾和大陆是同根同源的文化;两岸有着同样的历史传统,近现代承受着同样悲惨的命运,如今同样在为现代化而挣扎,而拼搏,而奋斗。中国要争存于世界各民族之林,“根抵在人”。人创造文化,文化又创造人,这是新时代的血脉。这才是台湾和大陆,李敖和我们无法分离的纽带。这也是《李敖大全集》出大陆版的特殊意蕴。

—

李敖是值得一读的:不仅台湾,而且大陆;不仅现在,而且可见的将来。

这是因为李敖充分关注文化问题,把握着中国一百五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这个枢纽。他不仅作《传统下的独白》,《独白下的传统》,不仅作《中国性研究》,《中国命研究》,在他笔下,无论历史、思想、法律、道德、教育、政治与人物,无不聚焦于文化,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、文化性质与文化的品味。李敖从不空谈,每一个问题都引征大量的历史文献或文字资料,有时达到“资料轰炸”的地步。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、他的结论,你决不能无视他提出的证据,甚至正是这些资料将推动你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。李敖又决不死守书本,埋头于故纸堆中,他把现实社会中人们现有的思想作为思想资料加以分

析、研究，并给予辛辣的抨击，于是他引征的历史资料与现实的活思想相结合，显示出生动活泼的生命力。李敖的文章风行一时，能够激发青年读者的狂热，争相阅读，这是一大关键。

李敖充分关注文化，活的文化，出于一种坚信，他说：“有一个问题紧逼着我们，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困惑。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说它是一个暂时不足论的问题，它比政治的问题，军事的问题，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，并且无法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拖延它应有的答案。”

这是事实。人从动物进化而来，人之成为人，伴随着生物学意义的进化产生了心智，出现了智人，也即现代人，于是产生了文化。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形成一种文化，一种文化又规范一种生存方式。文化即人化，也即所以化人。生产力可以发展，经济可以从游牧到畜牧、到农业、到工业、到信息时代，决定人们生存方式的根本观念即文化的根本内涵可以基本不变；政权可以嬗变，朝代可以改换，人们生存的方式即根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基本不变；也即文化的根本内涵基本不变。一部二十四史，一部世界史，充分展现了这样的事实。当文化的根本内涵出现革新，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根本改变，人成为新人，政治成为新的政治，社会成为新的社会，这才是新的境界，新的人间，新的世界。

二

世界归根到底是青年们的。他们如果没有被暮气沉沉的文化所污染，或已经从暮气沉沉的文化中惊醒起来，天生朝气蓬勃，富有青春活力，要追求新的生活，要创造新的生存方式。1961年，一个台湾大学的学生，发表《老年人和棒子》，抨击统治台湾的“老年人”拿的是一根“莫须有的棒子”、“落了伍的棒子”、“不放手的棒子”，呼唤着社会的年轻化。这立刻激发青年人的躁动和老年人的愤慨，展开了一场笔仗。因为他触动了社会的神经，击中了“老年政治”的要害。这个青年就是李敖。

紧跟着第二年，在台湾爆发了中西文化论战。李敖的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》，再次成为论战的中心。李敖笔下堆积的史料如《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?》和无所顾忌的笔锋如《论“处女膜整型”》，使求新者欢呼雀跃，而守旧者痛心疾首。李敖名声大震，几成青年们的偶像。

在台湾爆发的这场中西文化论战，实在是全中国的一个古老话题，一场纠缠不休，常战常新的论争。至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，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就已经开始了。1898年张之洞发表《劝学篇》，提出“旧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；一百年来“体”“用”之争，至今不绝。大体计算，真所谓七八年来一次了。虽然名目不同，但框架未变。虽然也有变化，有发展，但本末不清，病根未除。一方是国粹论，中西互补论，中国本位论，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论，万变不离其宗的儒学；一方是中体西用论，西化论，全盘西化论，西体中用论，充分世界化论，充分现代化论。

这也是历史的必然。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。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根深叶茂，而又极富人生智慧。远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，伟大的孔夫子即有教导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孔夫子伟大的学生孟子又是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”而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千年间，从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过程来看，这又的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。待到鸦片战争失败，面对一时无法战胜的列强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既有深厚的顽强的民族心理作基础，又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必然应对，“中国本位”更是天经地义的祖训，保种、保国、保民、保国粹纠缠在一起，已然成为一个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上的死结。尽管在“五四”以前，鲁迅已经发出觉醒的呐喊：“保存我们，的确是第一义。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，不管他是否国粹。”充耳不闻，无所用心的人们，特别是知识者，又特别是许许多多自以为乃知识者精英的人们，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长的时间里，简直是有增无已。

台湾，怎么会例外呢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那不过是在1962年明火执仗，营垒分明地爆发了又一轮中西文化论战，不仅打笔仗，而且诉诸法律，名副其实地大打官司。李敖在这两个战场上，都是胜利者。

而李敖异军突起，用他罕见的博闻强识，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聚讼纷纭的论争，旗帜鲜明，生动活泼地指证死守传统、夜郎自大的儒者的病症，计十一种，如下：

义和团病

中胜于西病

古已有之病

中土流传病
不得已病
酸葡萄病
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
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
挟外自重病
大团圆病
超越前进病

李敖认为前“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。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，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。”中间“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”。“他们既宣扬中土的‘道’‘体’真传，又承认洋人的‘器’‘用’价值。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，方法是两全的”。最后“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，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，也是最动听的老调”。李敖又指出以上病症的四个病因：第一个是“泛祖宗主义”；第二个是“浅尝即止的毛病”；第三个是“和经济背景脱节”；最后，第四个是“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”。

是的，李敖也难免失误。一是重蹈胡适的覆辙，一度赞成“全盘西化论”。胡适 1935 年 3 月发表《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》的文章，三个月后即加以修正，发表《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》，说“我不曾特别声明‘全盘’的意义不过是‘充分’而已，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。/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，与其说‘全盘西化’，不如说‘充分世界化’。”李敖在 60 年代坚定地主张并绝对肯定“全盘西化论”，用他的话说是“在文化移植上，要椟就得要珠，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，椟中没有珠也不成其为椟，要就得全要，不要也得全要”。胡适三个月纠正的错误认识，李敖花了几乎近三十年。要到 80 年代中期，李敖才声明：“我所谓‘全盘西化’只是充分地世界化、现代化，并非百分之百，这是语言在运用时无可避免的限制。”

然而，在李敖，这不是语言运用问题，他主张“全盘西化”的时候，是赞成一种“文化本是‘完全的整体 (integral whole)’”的理论，“文化是没有选择性的”的观点。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。

文化从来不是一个“完全的整体”。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，国土辽阔，历史悠久的文化，更不是“完全的整体”。中国传统文化，照旧说是儒道佛三家及其错综复杂的互相渗透。依我看，旧说中的道家，它的“始祖”及“主将”的老庄，和道家是根本不同的。老子和儒家一样，主张治世，不过方法不同。而庄子是独立的一家，主张以生命为本体和本位，“顺乎自然”，“完身养生”，既不讲治世，也不讲求长生不老的仙道。而且每一种文化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，都将分化，都是派别林立的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，韩非子已经指出“儒分为八”；荀子且指责孟子离经叛道，是孔子学说的罪人。文化的“完全的整体”事实上是不存在的。

而且，文化的变革，发展，移植，从来是有选择性的。儒家经典的《礼记·大传》早已指出：“圣人南面而治天下，必自人道始矣。立权度量，考文章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殊徽号，异器械，别衣服，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。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：亲亲也，尊尊也，长长也，男女有别，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。”几千年来，这一个半世纪之间，我们的度量衡，文章，正朔，服色，徽号，器械，衣服，哪一样没有变革？而且变革得层出不穷，变革得彻头彻尾。关键在于，这不过是文化的枝叶罢了。“其不可得变革者”，才是根本，儒家的根本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。这就是“亲亲也，尊尊也，长长也，男女有别”也。“亲亲”是血统论，“孝”呀“悌”呀，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呀，只能用夏变夷而不可以夷变夏呀的一套。“尊尊”“长长”是一长制，在家是家长制，在国是君主制，在“天下”是帝王制，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。“男女有别”是男尊女卑，“男帅女，女从男，夫妇之义由此始也。妇人从人者也，幼从父兄，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。归根结蒂，无论从血统、从性别，从社会、国家，统统把人纳入严密的有上下，有大小，有贵贱的一长制体系，消灭个人独立的人格，建构人身依附，一级一级制驭着的制度、圣道、文化；必须坚持，“不可得与民变革”的文化的命根子。

文化就是这样，在事实上，在理论上，在实践上，都可以分析，可以选择。正像李敖，坚持穿长袍的时候，可以主张“全盘西化”，而脱下长袍改穿西服的时候，又可以坚持孔夫子的男女观，认定“唯女子与小人与热带鱼为难养也”。李敖笔下歧视、轻贱甚至侮辱女性的言论是非常惊人的。像“我有一句名言——女人的政治方向是跟着‘锤子’（男性生殖器）方向转的，没有什么正义

标准”；“新女性，只能床上俯仰一世，却妄想床下一世俯仰”。等等等等，连篇累牍。“男女有别”，男女不平等，今天依然是世界性的大问题。许多国家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了，在事实上却远远没有平等。这也显示，文化的优劣，野蛮与文明，先进与落后，文化价值判断的标准，不在东方西方，中国外国，而在人的生活本身，在生存方式的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，有利于人的温饱，有利于人的发展，是否富有人情，是否能够提高人性。

三

中国历来注重文化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又发生了一场“五四”文化革命。这受到靠文化解决问题的批判。李敖又认为“它比政治的问题、军事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”，是不是错了呢？

不，不错，文化重要，并不等于专靠文化解决问题。五四一代人倡导文化革命，不是也提出“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，孙中山奔波一世，而中国还是如此者，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，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”么？提出“民主”的口号，其重要内容不正在于政治么？就在文化论战中，也曾提出“国体论战”，“民治与独裁论战”这样的政治性题目。而且在几十年的长时间中，同时进行着“以农立国”和“以工建国”这一经济理论问题的论战。可见，在思想上，在实际上，从来没有什么专靠文化解决问题的问题。

文化之所以成为根本，正如经济关系背后乃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样，政治，军事，归根结蒂在于人，为了人。老子是中国文化的伟人，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学家。可惜几千年来人们只注意他的“为无为，则无不治”的治国的方法论，而无视他“人之不善，何弃之有：故立天子，置三公”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原则。翻成现代语言，不就是说为了保障每一个人——包括“不善”的人——的权利，生命的权利，生存的权利，发展的权利，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么？！这和中国传统的“牧民”政治是完全相反的，这就是政治问题中更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。

李敖的命运是这样，李敖的创作也是这样。当国民党当局依据恶法，用“莫须有”罪名将李敖逮捕下狱，判刑十年，就为李敖打开了研究政党、研究政治的大门，成就了《孙中山研究》、《蒋介石研究》、《蒋经国研究》、《国民党研

究》、《民进党研究》等一系列著作。

在有悠久的发达的合纵连横、折冲樽俎的政治传统底下，阅读李敖坦承“在感情上，我无爱于国民党，却有爱于民进党”的政论，令人惊讶而且耳目一新的，是他“在理智上，两党对我都一样，它们的荒谬、错误与横行，都在我口诛笔伐之列，我只是用证据来拆穿邪恶、维护真理”的文章做法。李敖声明“我们党外的目标是自由民主，一切就是要公开，就是要讨论嘛！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正确或错误，都要从讨论得来，怎么能关着门办事”？有了这样的不同于旧的传统政治的文化思想，于是有李敖“就是打明牌，不要打暗牌”的光明亮堂，痛快淋漓的文章，于是也才能与老百姓与读者的心相通，并赢得信任与青睐。李敖是个聪明人，他真正明白：“我对蒋介石，绝不因为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，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，是不对的、不客观的、是非不明的，也是令人看不起的，我绝不如此。”

李敖对于国民党的研究，值得注意的，是揭露国民党“秘密结社”的出身和性质，以及“既不能也不愿辨别国的利益是高于党的利益的”法西斯本质。虽然国民党的“党国”专制，在它执政后即暴露于天下，受到爱国志士的严厉抨击，但李敖在几十年后再次指出这一点，对读者认清国民党的顽固性及其腐朽，对民进党的建党及其操作模式，亦步亦趋学国民党，台湾政事是什么样子，都有相当的启示。

四

李敖的文字有个性，有特色，因而有读者。这是真的，他几乎将中国做老八股、新八股、假大空的好文章的范式荡涤净尽。李敖也很自负，他一再宣称“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，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、李敖、李敖”。这自然只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估。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知人，论世，衡文，历史老人虽然不尽公平与公道，反反复复也常有，毕竟什么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

李敖的语言，六七十年代和 90 年代是不尽相同的。他的确属于“狂叛品”，的确像他所说明的：“狂叛品的文章最大特色是率真与痛快，有了什么，就说什么；该怎么说，就怎么说。狂叛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在表达作